



国学经典书系（**第一辑**）普及版

总主编 雷恩海

《荀子》

品读

王富鹏 著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LANZHOU UNIVERSITY PRESS



国学经典书系（第一辑）普及版

总 主 编	雷恩海					
副 主 编	陈晓强	曾贤兆				
编 委	蒋 凡	吴兆路	周绚隆	方 铭	马永强	
	雷恩海	陈文江	崔 明	陈晓强	曾贤兆	

《荀子》

品读

王富鹏 著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LANZHO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荀子》品读 / 王富鹏著. -- 兰州 : 兰州大学出版社, 2016. 11

(国学经典书系 / 雷恩海总主编)

ISBN 978-7-311-05049-8

I. ①荀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荀子》—通俗读物 IV. ①B222.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8247号

责任编辑 王淑燕

封面设计 郇海

书 名 《荀子》品读

作 者 王富鹏 著

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(地址: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)

电 话 0931-8912613(总编办公室) 0931-8617156(营销中心)
0931-891429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<http://press.lzu.edu.cn>

电子信箱 press@lzu.edu.cn

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mm×1020 mm 1/16

印 张 19.5

字 数 269千
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11-05049-8

定 价 40.00元

(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、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)



序



雷恩海

—

“国学”是一个历史名词,出现于清末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,西方在完成其政治变革与工业革命之后,开始有计划地东进,东方世界成为西方开发的巨大市场,并且带着强烈的殖民性。欧风美雨东渐,以坚船利炮裹挟着强势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思潮,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,而且曾是朝贡体系内的日本,也以强势侵袭。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,中国学人惊惧、疑虑、拒斥、反思,有亡国灭种之忧患,进而提出要对中国的学术进行全面的研究。最有代表性的是张之洞,在《劝学篇》中提出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强调在保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,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与中国政治、文化不冲突的外来成分。实际上,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,西方先于东方实行近代化,当东西方遭遇之时,必然会带来冲突。这一现象,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“中西之交,古今之异”。“国学”的概念,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。国学,即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。时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教授认为,“所谓国学者,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”(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》)。蔡尚思说:“国是一国,学是学术,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。其在中国,就叫做中国的学术。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,那就无所不包了;既然无所不包,也就无所偏畸了。”并且说“中国的固有文化,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”(《中国学术大纲》)。应对西方文化之强势进入而产生的“国学”概念,既要保全中国故有文

化学术,又要汲取西方学术文化之精髓,承载着统合中西文化的使命。1902年,黄遵宪《致梁启超书》赞同梁氏“养成国民,当以保国粹为主义,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”,并且说“今且大开门户,容纳新学。俟新学盛行,以中国固有之学,互相比较,互相竞争,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,真道理乃益明,届时而发挥之。彼新学者或弃或取,或招或距,或调和,或并行,固在我不在人也”,主张融会中西学术,开启国学之新局面。1911年,国学大师王国维为《国学丛刊》作序,明确指出:“今之言学者,有新旧之争,有中西之争,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。余正告天下曰:学无新旧也,无中西也,无有用、无用也。何以言学无中西也?世界学问,不出科学、史学、文学。故中国之学,西国类皆有之,西国之学,我国亦类皆有之,所异者,广狭疏密耳……余谓中西二学,盛则俱盛,衰则俱衰,风气既开,互相推助。且居今日之世,讲今日之学,未有西学不兴,而中学能兴者;亦未有中学不兴,而西学能兴者。”因而,“国学”就是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,对中国学术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,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,也是传统学术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自身位置的一种努力。当时尚有国粹、国故之称。国粹,似乎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;而国故则指本国文献(过去的文献),但国故只能代表研究的对象,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。相比较而言,还是“国学”一词,比较全面公允一些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兴起“国学”热,积极响应者有之,批评者有之。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,“国学”持续受到许多人的欢迎,人们对国学的认识也日趋理性。国学热之兴起,乃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,虽然我们的国力增强了,但到今天为止,我们仍然处于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,无论科技,还是文化等,西方仍然处于领先地位,世界仍然处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格局之中。那么,如何在科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成为世界强国,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价值、精神文明体系,确立文化自信,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。显然,重新审视传统,阅读传统,就成为一种必然。国学热,乃民间自发,而最后由在上者所认识而进一步倡导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,“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



的根本,如果丢掉了,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”,极为精辟地指出了国学的根本内涵和意义。

研究国学,并非抒发思古之幽情,更不是排斥来自西方的新思想。国学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积淀,承载着传统文化,而传统是演进的而非僵化的,是历史与现在之间的价值纽带。国学不但是历史的积淀,而且也是面对现在而指向未来的。因此,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国学是不应该被忽略甚至于忘记的。忽略甚或忘记了传统,也就失去了当下的根基,无法谋划现实的生存,因而也无法明确未来的走向。譬如,一个人今天早晨起来后,他失忆了,忘记了昨天及以前的事情,那么,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我,不知道今天该干什么,无法安顿自己,即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定位。他忘记了自己的过去,站在大街上,茫茫然不知所从,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,是去市政府上班,还是进入学校教书,是去清扫马路,还是到工厂做工。不知道今天做什么,就无法安顿心灵,也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状态,那么他将如何生存呢?忘记过去,就是割裂其历史;不知道今天,那么,就无法知道明天。事实上,忘记了昨天,就意味着今天、明天都处于一个无所举措的状态。一个民族也是如此,忘记其传统,割断历史,就没有现在的发展和未来走向;而继承、发扬其优秀传统,以开阔的视野,吸收新的文化素养,吐故纳新,继往开来,它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
国学,从广泛意义上来说,就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。学习国学,即在于传承文化,以一种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,继往开来。“所谓文化,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,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、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,一种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。”那种以学术为生命的不懈追求,正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,是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所在。文化割弃了传统,是贫瘠的文化,最终也就导致其衰败。没有文化的民族,即没有其灵魂。陈寅恪先生在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〉下册审查报告》中提出民族文化本位的问题:“是以佛教学说,能于吾国思想史上,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,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。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,若玄奘唯识之学,虽震动一时之人心,而卒归于消沉歇绝……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,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

东欧之思想,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,在吾国思想史上,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,且亦终归于歇绝者。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,有所创获者,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,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,乃道教之真精神,新儒家之旧途径,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

文化是民族的根性所在,马克思说:“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,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,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,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”传承文化,发扬优秀传统文化,以开阔的视野、恢弘的气度,与世界上诸多文化交流,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,继往开来,开拓创造华夏文化的新境界。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的睿智,提出“阐旧邦以辅新命,极高明而道中庸”,乃是对华夏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的高度概括,也是对华夏文化吸收外来文化,融入世界潮流的期望。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——希望华夏民族能够奋发图强,成为一个拥有优秀而悠远的文化传统、具有开阔视野和创新活力的现代化国家。没有继承,就没有创新,关键乃守正而出新。

二

一般来说,国学大致被理解为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,其内容应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学,融合儒释道诸家,而又以儒学为主体。事实上,国学乃一种载体,传承的精神品性、知识技能,可以说是经过时间淘汰而流传下来的精华。国学需要借鉴西学的研究方法,汲取其学术素养,全面整理、研究,融会贯通,传扬其优秀文化品质。一个人的成长,要有自身资源、家庭资源、社会资源,还要有历史资源。而这历史资源就是国学所承载的主要内容。

读书不仅仅是获取信息,储备知识。这种记诵之学,在严格意义上讲,不是学习的根本目的。就是说,读书乃为求知,在于培养具有思想性的人才,借助作者的思维过程、思维方式,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,提高自身的水平与





能力。知识之获得,不可能凭空而来,必须借助于某种媒介,通过一种介质的训练、培养,而使我们获得知识,化为能力,练人才性,提升思维能力。训练思维,培养能力,正是读书学习的关键。学习前代的文化典籍,正是训练思维、获得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。爬罗剔抉,提要钩玄,乃逻辑思维的归纳与演绎之训练。读一本书,如果仅仅停留在了解一个故事、事件的层面,显然是浅层次的;而有意识地、主动地借助于他人的思维方式、思维过程,训练自己的思维,培养自己观察问题、处理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无疑是深入的读解,达到了读书求知之目的。而阅读理论性的书籍,其精密的逻辑思维、推理论证、辨疑析难的能力,显然对训练思维、培养能力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说:“积学以储宝,酌理以富才,研阅以穷照,驯致以绎辞。”源远流长、充实丰富、瑰丽多彩的国学经典,积淀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品。阅读、研究,正可以训练思维,培养能力。

然而,长期以来,我们忽略了对国学的阅读与传承,甚至于忽略了阅读本身。所谓“国学热”“文化热”,事实上并没有“热”起来,往往呈现为喧嚣的“争鸣”,甚至是浮躁的状态,尚未切实地进入阅读本身。在热闹、喧嚣的“文化热”氛围之中,如何自我定位,如何寻求阅读的对象、内容,需要做出“冷静”的判断。说到底,阅读是一种个人行为,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、知识储备,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,以进德修业,提高自身文化品性和判断问题、分析问题的能力。这就需要不盲从,不跟风,有自己的定见,根据自己的需要,或者研究的需要,有针对性地阅读,这样才会有比较快的提高。

所谓阅读,就是指对一部书,或者一篇文章,从头到尾地读下来。清人冯班在《钝吟杂录》中说:“多读书则胸次自高,出语皆与古人相应,一也;博识多知,文章有根据,二也;所见既多,自知得失,下笔知取舍,三也。”这样读书的好处,首先是专注。思想集中才有兴趣。无论任何科目,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,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,兴趣即盎然而生。第二个好处是系统深入地理解。因为能够专注地读完一篇文章、一部书,对作者的思想与意图以及文笔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说,他

读书是拿到一本书,从头读到尾,即使这部书不太好,也不中辍。因为从头读到尾,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,好在何处,不好又在何处,斟酌损益,当有所得。第三个好处,思维空间很大,触类旁通。一篇文章或一部书,无论是记叙类的,或者是理论类的,都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,会围绕着事件或问题,全面地展开,这样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思考的场域,从而调动自己的思维,开拓思维能力,进而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和理解水平。第四个好处,就是训练思维,提高能力(阅读能力,理解能力,更是判断问题、分析问题、处理问题的能力)。就是说,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。海量信息有时候是无用的信息,反而淹没了读者,导致他们不会判断、分析,成为散乱信息的收集者,成为“两脚书橱”。第五个好处,就是加强知识的系统性。任何知识都有其系统性。清代著名作家、画家郑板桥用盖房子的道理谈画竹子的体会:“昔萧相国何造未央宫,先立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,然后以别殿、内殿、寝殿、宫室、左右廊庑、东西永巷经纬之,便尔千门万户。总是先立其大,则其小者易易耳。”先立其大,即要有大判断,对研究对象要“目有全牛”,而不是盲人摸象。分清何者为主纲,何者为末节。主纲确立,而后细节才能发挥作用,有益于支撑和加强主纲,两者相得益彰,发挥更大的效益。知识是系统的,读者把握住一端,由此深入下去,既是深度的钻研,也是广度的拓展。这样读书,就能够触类旁通,举一反三,摆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镕裁》说:“首尾圆合,条贯统序。若术不素定,而委心逐辞,异端丛至,骈赘必多。”知识系统和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,对问题的认识,也就能够识其大体,有大判断。

三

作为一个中国人,应该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所了解,既要知其精粹思想,也要了解其陈腐的观念;要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,还应有虚心诚实的心态,以了解之同情对文化传统继承与发扬。文化的发展,有累积性,也有否定性,因而才能创造性地继承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革故鼎新,既要延续我们的文化,

又要创造新的文化传统。

与现代学科分类不太相同,国学包括义理之学、考据之学、词章之学、经世之学,涵盖传统四部分类的经、史、子、集,内容丰富,贡献巨大;既有知识性的体系,又颇重视经世之学,强调“载道”,传达一种精神品性。事实上,学术研究、文化传扬,实乃“网罗天下放佚旧闻,稽其成败兴废之理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(司马迁)。

因此,我们编撰这套“国学经典书系”,既重视知识的系统性,也强调“载道”及人格之养成。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,什么是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基本的、核心的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。国学经典对人的道德品性形成,有其重要意义。格物致知,正心诚意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由内而外,由个体而推广及于整体、国家以至于天下;反过来,又由天下情怀而对个体的道德品性做观照,提高个体的境界。而且,国学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,乐群、敬业、爱国、独立思考,既注意上下有序,又重视人的自觉与平等。乐和同,礼别异。在追求个性自由、重视个人之同时,也不忽略集体性,将个体与家国利益相统一;既要有灵活性,能够跨界创造,又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,坚守岗位。国学经典有助于培养读者的思维能力、思维方式,提高基本文化素养。从狭义来说,知识是技能性的,而文化则是一种能力,一种判断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也是一种生存的境界。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《新原人》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分为四种:自然境界,功利境界,道德境界,天地境界。天地境界,不是直接的经世致用,而是融入了一种可以包容天地的胸襟,这是道德、人格的升华;升华到与万物为一,超越其他三个境界,而有了物我一体、万物皆备于我的相通,这时精神最为自由,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。这种对学术的痴迷,纯粹出于兴趣的探索精神,很有一些中国古人所说的“谋道不谋身”的意思,对形而上的“道”的追求,自然会获得“谋身”的结果。而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理论创造,所依赖的正是这种“谋道”的精神。国学经典是最佳的媒介,读书明理,获得能力,而非仅仅是“两脚书橱”的知识储备。世界文明古国,只有中国是自古



延续至今。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，传承创新，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使命。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、坚韧不拔的毅力、文化的包容品性，都是我们走向未来、开创未来的思想文化资源。

“国学经典书系”以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编选篇目，针对不同的读者群，分为初级版和普及版，由原文、题解、注释、品读、扩展阅读等模块构成。原文，选择佳好的版本，如精校本、注释本，选编原文，力求保持原典的本来面目，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、佳好的文本，使读者能够对原典有一个全面、整体的把握。题解，乃是对所选的篇章、片段，做出一些必要的交代和说明，以便明了上下文之间的内容及关系，有助于读解文本。注释，力求简洁，一般只注字、词，不注句子，方便阅读和理解。品读，乃是对所选原文的品评、欣赏、理解，着重从故事性、趣味性上，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，讲述其丰富生动的内涵，“理”寓于“事”中，“事”因“理”而深刻、生动。品读也尽可能地揭示思想的力量、文章的内涵以及思维的逻辑，期望有助于阅读能力的提升。扩展阅读，则是选择与原文相关（相似或相反、不同视阈的记载等）的内容，或者见出所选的文字、故事在后世的影响或衍生，启发联想，拓展知识，训练思维。而品读和扩展阅读，事实上是将阅读与思考结合起来，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。弗朗西斯·培根说：“读书使人成熟，讨论使人丰富，写作使人严谨。”读、思、写三位一体，写是在多读深思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的表现。写出来，才是对思维的进一步完善；读、思、写相结合，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阅读水平，训练思维，进而使人可能具有天地境界。

这套书系的编撰，力求内容丰富、生动，富有启发性，引起读者对国学原典阅读的兴趣，丰富其国学素养，培养读书的境界。近代大学者王闿运说：张之洞是看书人，曾国藩是读书人，“所谓读书人，能通经致用；看书人，则书是书，人是人，了不相涉，即所谓记问之学、博而寡要者也”（刘成禺《世载堂杂忆》）。就是说，读书人要能掌握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之中，知行合一。期望我们都做个有思想、有创造力的“读书人”。

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。读书学习，就在于确立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

基。古人云：“立身以力学为先，力学以读书为本。”所谓“立身”，实乃关乎其人之思想境界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有思想的生命才是完整的。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，则有什么样的“立身”原则、行为方式，也因而确定了其人日后的成就。思想清明、品格伟大之人，介然有守而不因循守旧，也不随波逐流。读书人知行合一，多读书，可以怡情悦性、涵养性情，可以洞明事理、培育思想，从此打开一个智慧的世界。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，观古今于须臾，抚四海于一瞬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2017年11月10日

春融堂

序



009

前言

荀子是战国末年最杰出的思想家，是先秦与孔子、孟子鼎足而三的儒学大师。有人认为其价值和重要性超过孟子，当呼之“荀孟”。无论“孟荀”还是“荀孟”，可以肯定二人当可比肩。有人认为他是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。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，但可以肯定诸子百家都是他思想的材料，他对诸子百家的思想也都有批判和吸纳。

荀子，姓荀，名况，一说姓孙，称孙卿子，战国末年赵国（今山西安泽）人，约生于公元前335年。十五岁时游学齐国稷下（在今山东淄博）。刘向《别录·叙录》称“孙卿善为《诗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”。司马迁《史记·孟轲荀卿列传》说：“齐襄王时，而荀卿最为老师。齐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为祭酒。”也就是说在齐襄王时，荀子是学界公认的泰斗。

荀子也曾周游列国，游说诸侯，宣扬自己以王道统一天下的主张。他东至齐鲁，西入秦都，北到燕赵，南至荆楚，详细考察了各诸侯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，尤其对齐、秦、赵、楚等国的情况有更为深入的研究。应秦昭王及应侯范雎之邀，来到秦国，建议秦王“节威反文”，用仁义之道统一天下。到赵国与赵孝成王、临武君、陈嚣、李斯等探讨“兵要”，说服赵王，而称为上卿。荀子在齐国十余年，曾建议齐国国相田文（孟尝君）“处胜人之势，行胜人之道”。后遭谗，由齐至楚，楚相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（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）令。因受人谗毁，被解聘，遂离楚归赵，后又受到春申君的再



三请求,复聘为兰陵令,公元前238年,春申君在内乱中被杀,荀子废职,最后定居于兰陵,终老于此。

在思想的传承方面,荀子以孔子和仲弓思想的嫡传自居。推崇仲尼和仲弓为“大儒”,贬斥子思和孟子为“俗儒”,攻击子夏、子游、子张为“贱儒”。荀子与孔子一样广收门徒,因传道与孟子齐名,传经更优于孟子。荀子在《劝学》篇中提出“始乎诵经,终乎读《礼》”,会通群经,以经世致用,将学习目标引向做圣人君子,“始乎为士,终乎为圣人”。据刘向、班固、陆机、陆德明等人的记载,荀子当为经学之太祖,汉代的《礼》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乐》《春秋》之学皆源于荀子。康有为评论说:“孔子两大派,孟子、荀子,传经之功荀子最多。”(《万木草堂口说》)荀子为政理民的思想也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用。

与孔孟作品的语录体不同,荀子的作品多是结构完整的专题论文。数十篇专题论文构筑成全书一个完整的体系。荀子的作品,早由其门生编辑成书,至少当有十种以上不同的《孙卿书》。弟子各人所藏作品多少不等,所以各种本子互有参差。西汉时期汉成帝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整理荀子著作。刘向将其所见荀子作品三百二十二篇,删除重复的二百九十篇,定为十二卷三十二篇,取名《孙卿新书》。荀子著作流传后世,刘向功莫大焉。东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孙卿子》三十二篇。唐代元和年间,登仕郎、守大理评事弘农人杨倞第一次为《孙卿子》作注,重新调整篇目的次序,根据内容分组编排,改十二卷为二十卷,定名为《荀子》。此即今本《荀子》之始。

荀子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独具特色。在多个领域,如哲学、伦理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教育,乃至文学,他都有精到的见解和创造。

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先秦诸子热衷讨论的问题。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直接关涉到一个人的哲学观。殷商西周时期,“天”“天命”是人格化的神灵,可谓之“天神”。因此敬天、祭天的活动非常普遍。孔子的言语当中,天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,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。孔子之后,其弟子和后学将“天”“天命”“天道”义理化、价值化。到了荀子,对以前曾附着在天上的神秘色彩又进一步去除了。荀子认为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”。在荀子



看来,天是自然的,没有理性和意志,也没有善恶好恶之心。天是自然的天,而不是人格神。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,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。荀子认为“天能生物,不能辨物,地能载人,不能治人”(《礼论》),“天有其时,地有其才,人有其治”(《天论》),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,人类有自己的职分,天人相分,互不主宰。虽然“天行有常”,但人可以了解掌握并遵循这些规律,“制天命而使之”,“应时而使之”。在荀子看来,与其迷信天的权威,去思慕它,歌颂他,等待“天”的恩赐,还不如利用自然规律更好地为人服务。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,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,“治天命”“裁万物”“骋能而化之”。

对于人性问题,人性是善,还是恶,先秦诸子也有不同的看法。人性本恶,是荀子著名的观点。荀子提出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”的命题。荀子说“生而有好利焉”“生而有疾恶焉”“生而有耳目之欲,有好色焉”,如果“从人之性,顺人之情,必出于争夺,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”。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对物质的天然欲求是与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,所以说人性是“恶”,而不是“善”。在他看来,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,是所谓“生之所以然者”。其自然表现为“饥而欲饱,寒而欲暖,劳而欲休”,这是人天然的生物本能。他认为这种天然禀赋的性是恶的。顺应其发展,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,导致社会的混乱,因此人必须学习,接受教化,接受礼义的约束,国家和社会才能安定。后天的环境对人性的改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通过人的主观努力,不断地学习和修养,人性之恶可以实现转化,“化性起伪”。不断积累善行,可以成为君子,乃至圣人。圣人不是天生的,与普通人是一样的,“尧、舜之与桀、跖,其性一也,君子之与小人,其性一也”。他说“圣人者,人之所积而致也”,只要不断地学习和修养就可以成为圣人君子,“涂之人可以为禹”,行走在路上的普通人,也可以成为像大禹那样的圣人。

荀子“法后王”的主张也为人所熟知。“欲观圣王之迹,则于其粲然者矣,后王是也”(《非相》),如果想知道远古圣王的情况,应该考察现在还能清楚地看到的后王的做法。也就是说,他虽然主张“法后王”,但并不反对“法先王”。他认为“先王”的时代久远,事迹简略,不如近世后王的清楚明白,所以

主张通过“法后王”，实现“法先王”的目标。在荀子的思想当中，法先王和法后王并不矛盾。

荀子的治国思想以礼为核心。他说“国之命在礼”（《天论》），礼是国家命运之所系。“礼者，治辨之极也，强国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功名之总也。王公由之，所以得天下也；不由之，所以损社稷也。”（《议兵》）礼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，是使国家强盛的根本，是威力行于天下的途径，是建立功名的总纲。天子、诸侯遵循礼，就能取得天下，反之国家就会受到损害。在荀子思想当中礼、法相融，礼与法是一体的。荀子虽然礼、法并提，但他在具体运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，实际上有一定的区分。他说“隆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”，“义立而王、信立而霸、权谋立而亡”。从荀子对礼、法等概念的具体使用情况看，礼与法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的两个概念。比较而言，礼、义相对于法、信来说，是处在更高层次上的。综合荀子的其他论述，可以说礼是制度层面的，具有原则性、方向性、纲领性，而法则具有强制性和具体操作性的细则和规程。荀子认为无论个人道德的修养，还是统治阶层的行政运作，都离不开礼。《大略》篇中说：“礼者，人之所履也。失所履，必颠蹶陷溺。”礼是人立足的根本。礼失，则无所置足。《大略》篇又说“礼者，政之挽也。为政不以礼，政不行矣。”政事要由礼来引导，不以礼为政，政治就不能畅通。具体到对普通百姓的治理只靠礼的引导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借助法的强制力。所以荀子说“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，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。”尽管礼与法针对的社会阶层有所不同，但法的制定却不能违背礼的精神。《劝学》篇说：“礼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”《性恶》篇说“礼义生而制法度”，可见法的制定必须符合礼的精神，以礼为依据。总之，在荀子看来，礼与法是不同的，但又是相融的、一体的。

荀子虽然非常崇尚礼在治国理民过程中的应用，但也比较重视法，因此常常礼、法并提，如“礼法之枢要”“礼法之大分”等。再者他的两位入室弟子韩非和李斯皆为法家代表人物，因此，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儒者的身份，以至于因其弟子而受到许多学者的抨击。由于这些原因，历代正统人士常有尊孟



贬荀的倾向,进而影响到对荀子思想价值的客观评价。历代为荀子作品作注的人不多,唐代杨倞是为其作注的第一人。清代考据学兴盛,注释校订者才有所增加。一个奇特的现象是,荀子一边受到一些正统人士的抨击,而其礼法兼施、王霸统一的思想,却自汉代开始就一直为最高统治者悄悄地采用着。清末的谭嗣同感叹道:(中国)“二千年来之政,秦政也”;“二千年来之学,荀学也”。

荀子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。《荀子》一书代表了原始儒家议论文的最高成就,逻辑严密,说理透彻,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很大。荀子《赋》篇是现今所知最早以“赋”名篇的作品,而且其主客问答的形式也为汉赋所继承,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别的地位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孙卿和屈原“皆作赋以讽”,为辞赋之祖,并著录《孙卿赋》十篇,居赋二十五家之首。

先秦诸子作品有不少是语录体著作,易读易诵,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和《老子》等;有些著作常用寓言说理,如《庄子》和《韩非子》等,这些寓言故事也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。荀子的作品几乎都是专题论文,多为鸿篇巨制,虽然也有很强的文学性,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,还是望而生畏。《荀子品读》针对荀子的作品逐篇进行解读讲评。每一篇作品根据具体情况选出最能反映荀子主要思想的若干段落,化整为零,逐段拟出小标题,分别进行注释和品读。注释,解决疑难字句;品读,就本段文字解说《荀子》,并对本段文字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简略的讲评。篇首“题解”,概述本篇的主要思想和论证方法,篇末“扩展阅读”以开扩视野,加深理解。若能每天阅读一段,持之日久,读完本书,荀子的主要思想也就基本掌握了,而且还能对先秦其他诸子的思想有所了解。

《荀子品读》的原文以王先谦撰《荀子集解》为底本,遇有衍误或与其他版本抵牾之处,在注释中会做出说明。

王富鹏